

·出土文献研究·

从帛书《二三子》论《周易·蹇卦》六二爻辞的本义

廖名春

内容摘要:帛书《二三子》篇所载孔子对《蹇》卦六二爻辞的论述,“戒今”可读为“戒申”,即“申戒”,叮咛告诫意也。“非言独今也”当读作“‘非’言读信也”,是说爻辞的“非信之故”之“非信”,意思是“读信”。“古以状也”当读作“故以状也”,即“故以‘蹇蹇’状之也”。而帛书《衷》篇“子曰:《蹇》之‘王臣’,反故也”之“反故”,即反对欺诈之意。《蹇》卦六二爻辞,无论是今本的“躬”,还是帛书《二三子》篇和楚竹书的“今”皆非本字,本字当作“信”。“蹇蹇”当为本字,义为艰难。“故”义为缘故,王引之训为“事”不可取。《蹇》卦六二爻辞的逻辑性、思想性很强,整个爻辞强调的是诚信对于政治的重要。由此可知,《周易》卦爻辞富于哲理,不能简单地以卜筮之书视之。

关键词:《周易·蹇卦》 六二爻辞 帛书 《二三子》

《周易》卦爻辞由于年代久远,不少已晦涩难懂,本义难觅。《蹇》卦的六二爻辞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”就是明显的例子。

一、《蹇》卦六二爻辞的旧训

王弼(226-249)注云:

处难之时,履当其位,居不失中,以应于五。不以五在难中,私身远害,执心不回,志匡王室者也。故曰: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。”履中行义,以存其上,处蹇以比,未见其尤也。^①

这是本于《彖传》、《序卦传》、《杂卦传》之说,将“蹇”训为“难”,将“躬”训为“私身”,将“蹇蹇”训为“处难”、“处蹇”。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”就是“王臣”有“蹇蹇”之难,并非他们自身的原因,而是忠于王事所致。这一解释实本于《小象传》。“蹇蹇”而“终无尤也”,终将没有过错。所以说“匪躬之故”,并非他们自身

^①《周易注疏》卷七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的原因。唐明邦因此将爻辞译为：“王公大臣处境极为艰难，这并非他们自己造成的。”^①

孔颖达(574–648)疏曰：

“王”谓五也。“臣”谓二也。九五居于王位而在难中，六二是五之臣，往应于五，履正居中，志匡王室，能涉蹇蹇，而往济蹇，故曰“王臣蹇蹇”也。尽忠于君，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济君，故曰“匪躬之故”。^②

这是说“王”在“蹇蹇”中，“臣”前“往济蹇”，“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”，“尽忠于君”，并不顾惜他们自身。也是以“躬”为“私身”，“故”表原因，“蹇”为“难”，“蹇蹇”则为“能涉蹇蹇，而往济蹇”。所谓“疏不破注”，大意与王弼注同。

对于王注孔疏的说解，清儒王引之(1766–1834)颇以为不辞，提出“故”当训为“事”，以为爻辞是：

言王臣不避艰难，尽心竭力者，皆国家之事而非其身之事也，故曰：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”不言“事”而言“故”者，以韵初爻之“誉”也。^③

并在《增字解经》一条中专门对孔疏提出批评：

经典之文自有本训。得其本训则文义适相符合，不烦言而已解。失其本训而强为之说，则阤陧不安，乃于文句之间增字以足之，多方迁就而后得申其说。此强经以就我，而究非经之本义也。如《蹇》：“六二，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”故，事也。言王臣不避艰难者，皆国家之事，而非其身之事也。而解者曰：“尽忠于君，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济君。”正义则于“躬”上增“以”字，“故”下增“不往济君”字矣。^④

后来黄寿祺(1910–1990)、张善文将爻辞译为：“君王的臣仆努力奔走济难，不是为了自身私事。”^⑤即汲取了王氏的成果。

不过，关于“蹇蹇”的训诂，不管是王弼注的“处难”“处蹇”说、孔颖达疏的“能涉蹇蹇，而往济蹇”说，还是王引之的“不避艰难，尽心竭力”说，都有问题。“蹇蹇”是“蹇”的重迭，只是加强了语气、加深程度而已，犹如“齐”与“齐齐”、“黑”与“黑黑”，重迭的结果，意义基本未变，只是程度加深了。而上引训释都将“蹇蹇”变成了动宾结构，都落入王引之所谓“增字以足之，多方迁就而后得申其说”的陷阱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早期文献引《蹇》卦六二爻辞却别有说。如《说苑·正谏》篇云：

《易》曰：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”人臣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，非

①唐明邦主编：《周易评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95年，第102页。

②《周易注疏》卷七。

③王引之：《经义述闻》第一，清道光刻本。

④王引之：《经义述闻》第三十二，清道光刻本。

⑤黄寿祺、张善文：《周易译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322页。

为身也；将欲以匡君之过，矫君之失也。^①

是解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”为不畏险难而进谏，“非为身也”，不是为了自身，而是为了“匡君之过，矫君之失”。

《魏志·陈群传》注引《袁子》：

或云：故少府杨阜，岂非忠臣哉？见人主之非，则勃然怒而触之；与人言，未尝不道也。岂非所谓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”者欤？^②

以“见人主之非，则勃然怒而触之”解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”，也是定义在进谏上。

《群书治要》引桓范（？-249）《世要论·谏争》篇曰：

国之将兴，贵在谏臣；家之将盛，贵在谏子。若托物以风喻，微生而不切，不切则不改；唯正谏直谏可以补缺也。《诗》云：“袞职有缺，仲山甫补之。”“柔亦不茹，刚亦不吐。”正谏者也。《易》曰：“王臣蹇蹇。”《传》曰：“谔谔者昌。”直谏者也。^③

这里的引文，将“蹇蹇”写作“蹇蹇”，与其“正谏直谏”的解释相呼应，说明爻辞之义就是讲进谏。^④

《说文》无“蹇”字而有“蹇”字。徐铉（916-991）曰：“《易》‘王臣蹇蹇’，今俗作‘蹇’，非。”^⑤黄生曰：“《易·蹇》六二‘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’，言人臣履历险阻，知有国而不知有身也。自《晋书·王豹传》引作‘王臣蹇蹇’，字家遂训‘蹇’为直言之貌，与卦义相戾矣。《广韵》：‘讙，吃也。’讙、难于言，蹇、难于行，故取其字为意。今引《易》而省作‘蹇’，又与吃义相戾。”^⑥都认为“蹇”为俗写，正文当作“蹇”。段玉裁（1735-1815）曰：“行难谓之蹇，言难亦谓之蹇。俗作蹇，非。”^⑦

但惠栋（1697-1758）意见却相反，其云：

“蹇”字下《说文》不引《易》，明《易》不作“蹇”也。徐氏反以“蹇”为俗，大误。当云：案古文《易》：“王臣蹇蹇。”今俗作“蹇”，非。^⑧

吴玉搢（1698-1773）也认为：

然屈原已用“蹇蹇”，而王逸时所见《易》即有作“蹇蹇”者。《衡方碑》“蹇蹇王臣”，亦用《易》语，而字亦作“蹇”。《晋·王豹传》亦引《易》“王臣蹇蹇”。则当时经本定有作“蹇”者。“蹇”固非俗作矣，不得以《说文》之漏略，

①《说苑》卷九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②《三国志·魏志》卷二十二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③魏征：《群书治要》卷第四十七，《四部丛刊》景日本本。

④以上三条，杨树达先生均曾引及（《周易古义》卷三，《杨树达文集·周易古义 老子古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56页）。

⑤《说文解字》卷二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⑥黄生撰、黄承吉合按、包殿淑点校：《字诂义府合按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126页。

⑦段玉裁：《说文解字注》卷二篇下，清嘉庆二十年经韵楼刻本。

⑧惠栋：《惠氏读说文记》第二，清借月山房汇钞本。

遂谓古无其文也。^①

他们都不同意徐铉说，认为“当时经本定有作‘謇’者”，“古文《易》”即作“謇謇”。

高亨（1900—1986）进而以“謇”为“蹇”之本字，认为“謇当训直谏”，云：

“蹇”借为“謇”。《一切经音义》十引本卦名作《蹇》。又六二云：“王臣蹇蹇，非躬之故。”《楚辞·离骚》王注、《后汉书·杨震传》李注、《三国志·陈群传》裴注、《文选·辨亡论》李注并引“蹇蹇”作“謇謇”。此本卦“蹇”字古本有均作“謇”字者之证。《楚辞·离骚》：“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。”王注：“謇謇，忠贞貌。”《汉书·龚遂传》：“蹇蹇亡已。”颜注：“蹇蹇，不阿顺之意也。”“蹇蹇”即“謇謇”。《说文》无“謇”字。《广韵》：“謇，正言也。”余谓“謇”当训直谏也，从言，寒省声。本卦“蹇”字皆借为“謇”也。“往蹇来誉”，言我直谏于君而人誉我也……知本卦“蹇”字皆谓臣直谏于君矣。^②

二、楚简《蹇》卦六二爻辞解读

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买回1200余支战国楚简，整理成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九本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其第三册所收四种典籍中，第一种就是《周易》。尽管是残本，所幸的是《蹇》卦的卦画符号和整个卦爻辞犹存。《蹇》卦的所有“蹇”，竹书本皆作“讦”，其六二爻辞作：“六二王臣讦=非今之古”。整理者濮茅左认为：

“讦”，《说文·言部》：“讦，面相斥罪，相告讦也，从言，干声，居渴切。”《玉篇》：“讦，攻人之阴私也。”“讦”，音与“謇”、“蹇”通，意亦相近……“讦=”，意同“謇謇”，直言。《楚辞章句·离骚经》“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，忍而不能舍也”，王逸注：“謇謇，忠贞貌也，《易》曰：‘王臣謇謇，匪躬之故。’舍，止也，言已知忠言謇謇，刺君之过，必为身患，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。”

“古”，读为“故”。^③

是以楚竹书《周易》本“蹇”均作“讦”为据，肯定“蹇蹇”当作“謇謇”，意为“直言”，否定了传统的训诂。

郑万耕意见也与濮茅左相同，同时他还指出这是高亨的创见：

此“讦”字从言，高说古本“蹇”均作“謇”，也从言，皆与言辞相关，足证此卦本义是讲正言直谏之事。而作“蹇”，也当依高说“借为謇”，不宜训为“险难”。^④

这是说，从楚竹书来看，高亨说是正确的。古人将“蹇”训为“险难”不可信，还是“正言直谏”靠谱。

①吴玉搢：《别雅》卷三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②高亨：《周易古经今注》，上海书店影印《民国丛书》本，1991年，第134—135页。

③马承源主编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三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183—184页。

④郑万耕：《周易释读八则——以楚竹书为参照》，《周易研究》2005年第2期。

三、帛书易传《二三子》篇相关文句的异见

《周易·蹇》卦之“蹇”和《蹇》卦六二爻辞到底如何释读，早于楚竹书《周易》二十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《二三子》篇实际给出了答案，只是我们没有读懂而已。

在我们整理的、也是最早面世《二三子》篇释文里，这一段文字作：

易曰：“王臣蹇蹇，非今之故。”孔子曰：“王臣蹇蹇”者，言亓难也。夫唯智（知）其难也，故重言之，以戒今也。君子智（知）难而备[之，则]不难矣；见几而务之，□有功矣，故备难□易。务几者，成存亓人，不言吉凶焉。“非今之故”者，非言独今也，古以状也。^①

在1995年1月出版的新释文，我修正了几字，作：

易曰：“王臣蹇蹇，非今之故。”孔子曰：“王臣蹇蹇”者，言亓难也。夫唯智亓难也，故重言之，以戒今也。君子智难而备[之，则]不难矣；见几而务之，[则]有功矣。故备难[者]易，务几者成。存亓人，不言吉凶焉。“非今之故”者，非言独今也，古以状也。^②

又过了差不多二十年，中华书局推出裘锡圭主编的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》全七册，其帛书《二三子》篇这一段的释文，与我们当年的工作，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，只是将“古以状也”句改为“古以（已）状〈肽（然）〉也”而已^③。说老实话，从1993年初做帛书易传释文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，我一直没有读懂这一段名之为“孔子曰”解《易》文字，所以只做释文，不加解释。其他的帛书易传研究者，倒是做了不少释读。

比如《蹇》卦六二爻辞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”之“蹇蹇”，帛书《二三子》引作“蹇蹇”，一从“足”，一从“走”，这是义符相近，可以通用。“匪”，帛书《二三子》引作“非”，楚竹书《周易》同，两字谐声相同，故可通用，而“非”为本字，这是帛书《二三子》、楚竹书《周易》优于今本者。但“躬”作“今”，问题就复杂了。

楚竹书《周易》“躬”亦作“今”，论者曰：

于隶定行文中，首先可视“今”为“躬”之误摹。事实上，作“今”作“躬”，两说可并存，而有语意上之程度差异……又可视为音近通假，“今”字古为见母侵部，“躬”字亦可写作“躬”，简本《缁衣》已有例证，《说文》亦以“躬”为“躬”之或体，古为见母中部，前文已说过，中、侵可通押，又一例也，此其三。要以第一说视为误摹者，最为不妥。^④

①陈松长、廖名春：《帛书〈二三子〉〈易之义〉〈要〉释文》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3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425页。

②廖名春：《帛书〈二三子〉释文》，《国际易学研究》第1辑，华夏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8页。

③裘锡圭主编：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（叁）》，中华书局，2014年，第43页。

④黄人二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三）研究·上博藏简周易校读（下）》，台中高文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66-67页。

楚简“今(见/侵)”，今本作“躬(见/冬)”。侵、冬旁转，故二字可通假。

如《诗经·大雅·思齐》三章以雠(东部)韵临(侵部)。^①

这都是肯定“躬”作“今”是音近通用，至于两者谁为本字，则不置可否。

赵建伟对帛书《二三子》篇的这一异文看法是：

“今”字各本均作“躬”，此读“躬”为“今”，音近相假(同为见母字，冬、侵合韵)。《礼记·表记》引《诗·谷风》“我躬不阅”即作“我今不阅”)。^②

谁是谁非，谁优谁劣，也是避而不谈。

刘大钧则认为帛书《二三子》篇和楚竹书作“今”更胜，他说：

帛书《二三子》中紧接“《易》曰：‘王臣蹇蹇，非今之故’”后有“孔子曰：‘王臣蹇蹇’者，言亓难也。夫唯智亓难也，故重言之，以戒今也……‘非今之故’者，非言独今也，古以状也”。由孔子之释更可确证帛本此爻作“王臣蹇蹇，非今之故”，与竹书本相同。而由此爻上下文意考之，其作“今”亦较之今本作“躬”似乎义更胜。今本作“躬”，恐抄书者失误。^③

丁四新也接受了这一意见^④。

刘彬等《帛书〈易传〉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》认为：

“今”，赵建伟、丁四新、刘大钧认为与“躬”互假，疑非。从下文“非言独今也，古以状〈肽(然)〉也”看，“今”与“古”相对而言，非“躬”字之假，应为“今”。上博楚竹书《周易》亦作“今”。此爻意为王和大臣都有危难，这种情况不只是现在才有，在过去也一样存在。^⑤

这是说“今”与“躬”不是通假的关系，而是不同意义的异文。他与刘大钧、丁四新一样，都以帛书《二三子》篇下文的“非言独今也，古以状〈肽(然)〉也”为据，认为“今”与“古”相对，“今”当为本字。

四、《蹇》卦六二爻辞的本义

笔者认为无论是今本的“躬”，还是帛书《二三子》篇和楚竹书的“今”皆非本字。从帛书《二三子》篇的论述和《蹇》卦六二爻辞的文意看，本字当作“信”。

《周易·蒙》卦六三爻辞：“勿用取女，见金夫，不有躬，无攸利。”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《周易》“躬”写作“躬”^⑥。战国古玺习见“中躬”印文，即读为“忠

①陈惠玲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三)读本·周易译释》，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，2005年，第92页。

②赵建伟：《出土简帛〈周易〉疏证》，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，2000年，第208页。

③刘大钧：《今·帛·竹书〈周易〉综考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60页。

④丁四新：《楚竹书与汉帛书〈周易〉校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07页。

⑤刘彬等：《帛书〈易传〉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20-21页。

⑥马承源主编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三)》，第136页。

信”；赵国兵器铭刻中，相邦建信君即写作“建躬君”^①。所以，曹锦炎将“不有躬”读作“不有信”^②，非常正确。按照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，“不有躬”是“是为女不能自保其躬”^③，解释非常牵强。而读作“不有信”，《蒙》卦六三爻辞“勿用取（娶）女，见金夫，不有躬（信），无攸利”就是说：“不要娶这个女子，她一看见有钱有势的男人，就没有信义了，娶她是不利的。”爻辞强调诚信的重要，文从字顺。

同理，《蹇》卦六二爻辞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”的“躬”或“今”也当读为“信”。“匪”当从帛书《二三子》、楚竹书《周易》读为“非”。今本之“故”，帛书易经本、帛书《二三子》引皆同，唯楚竹书《周易》作“古”，郑玉珊以为“古”为本字，将爻辞翻译为：

六二居中得正，象征六二人臣能助九五君王以渡蹇险。这非今朝之独例，而是古今皆然的事。^④

这样的译文，可以说是“增字为训”的典型。

其实“匪躬之故”读作“非信之故”，就用不着如此“增字以足之，多方迁就而后得申其说”了。“非信之故”即不讲诚信的缘故。正因为不讲诚信，所以“王臣蹇蹇”，非常艰险。由此可见，《蹇》卦六二爻辞“王臣蹇蹇，匪（非）躬（信）之故”，其实是一个倒装的因果复句：“王臣蹇蹇”是果，“匪（非）躬（信）之故”是因。译成现代汉语，“王臣蹇蹇，非信之故”即：君王的臣仆之所以处境非常艰难，就是因为不讲诚信的缘故。帛书《二三子》篇引孔子曰：“‘王臣蹇蹇’者，言其难也。”清楚指出，“蹇”义为“难”。由此看，《彖传》、《序卦传》、《杂卦传》“蹇”“难”之训，至为可信；读为“蹇”，训为直谏，则完全没有必要。至于将“蹇蹇”训为“处难”“处蹇”、“能涉蹇难，而往济蹇”或“不避艰难，尽心竭力”，更是辗转曲说，有违训诂学的规范。

笔者对《蹇》卦六二爻辞的这一解释，在帛书《二三子》篇里可得到充分地证明。

帛书《二三子》篇所载孔子对《蹇》卦六二爻辞的论述中，“故重言之，以戒今也”如何释读，是一大问题。陈惠玲认为“戒今”是“戒惕今之俗世”^⑤，刘彬以为是“告诫今世之人”^⑥，意思差不多。连劭名则认为“身同躬，故‘戒今’犹‘戒身’”^⑦。

①李家浩：《从战国“忠信”印谈古文字中的异读现象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87年2期。

②曹锦炎：《马王堆帛书〈易经〉札记》，《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——1992年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选》，湖南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36页。

③《周易注疏》卷二。

④郑玉珊：《楚竹书与汉帛书〈周易〉校注》，台北花木兰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473页。

⑤陈惠玲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三）读本·周易译释》，第92页。

⑥刘彬、孙航、宋立林：《帛书〈易传〉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》，第21页。

⑦连劭名：《帛书周易疏证》，中华书局，2012年，第213页。

案：此两说都不妥。“蹇”是难，重言而称“蹇蹇”，犹言很难，是强调难的程度，并非针对“身”和“今世之人”而言。所以，说“戒今”是“戒身”或“告诫今世之人”，实在是文不对题。

我意“今”当读为“申”。上文已论定“躬”和“今”可读为“信”，而“申”与“信”同属真部字，自然可以通用。东汉刘熙《释名·言语第十二》：“信，申也，言以相申束使不相违也。”^①魏了翁(1178–1237)《古今考》：“师古曰：韩申徒即韩王信，《楚汉春秋》作信都。古信、申同字。”^②《管子·七臣七主》“申主任势，守势以为常”，王念孙(1744–1832)《读书杂志》王引之补说曰：“申，读曰信。《汉书·高惠高后文功臣表》注曰：‘古信申同义。’信之通作申，犹申之通作信也。出政而信于民，故曰信主。”^③所以，帛书之“戒今”可读为“戒申”。《史记·历书》：“年耆禅舜，申戒文祖，云：‘天之历数在尔躬。’”^④《汉书·武五子传》：“齐怀王闳与燕王旦、广陵王胥同日立，皆赐策，各以国土风俗申戒焉。”^⑤《后汉书·郑兴传》：“天于贤圣之君，犹慈父之于孝子也，丁宁申戒，欲其反政。故灾变仍见，此乃国之福也。”^⑥“戒申”即“申戒”，叮咛告诫意也。帛书“重言之，以戒今也”，即“重言之，以戒申也”，是说重复称之为“蹇蹇”，是叮咛，是告诫。

“存其人，不言吉凶焉”，陈惠玲译为“只说人的努力态度，不讨论吉凶成败”^⑦。刘彬以为：“‘存其人’，吉凶成败全在于人。今本《系辞》：‘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’即此意。”并将此句译为：“从事情的微小征兆做起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在于做事之人，所以不必讲究什么吉凶了。”^⑧

案：此“存”字当训为关注、重视。《后汉书·桓帝纪》：“其舆服制度有逾侈长饰者，皆宜损省。郡县务存简约，申明旧令，如永平故事。”^⑨嵇康(223–263?)《答难养生论》：“又常人之情，远，虽大莫不忽之；近，虽小莫不存之。夫何故哉？诚以交赊相夺，识见异情也。”^⑩“人”指人的品性行为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”^⑪王安石(1021–1086)《祭欧阳文忠公》：“世之学

①刘熙：《释名》卷第四，《四部丛刊》景明翻宋书棚本。

②魏了翁：《古今考》卷二十五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③王念孙：《读书杂志》管子第九，清道光十二年刻本。

④《史记》卷二十六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⑤《前汉书》卷六十三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⑥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六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⑦陈惠玲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三）读本·周易译释》，第93页。

⑧刘彬、孙航、宋立林：《帛书〈易传〉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》，第21页。

⑨《后汉书》卷七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⑩《嵇中散集》卷四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⑪《孟子注疏》卷十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。

者，无问乎识与不识，而读其文，则其人可知。”^①“存其人，不言吉凶焉”，以人的品性行为为重，就不要计较什么吉凶利害。这里的“人”，即为人之道，换言之，也就是“信”。

“‘非今之故’者，非言独今也”，帛书这一句也很不好读，值得讨论。上文已经指出，“非今之故”当读为“非信之故”。那么“非言独今也”的“非”就不是一般的“非”，而是“非信”之“非”，指代“非信”之事。因此，这个“非”字当加引号，“非言独今也”当标点为“‘非’言独今也”。这个问题我1993年做释文时没有注意到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释文出了不少，仍然如此，令人感慨。

“言”就是说，没有问题。那么，“独今”就是对“非”，也就是“非信”的解释。赵建伟认为“非言独今也”当作“言非独今也”^②，陈惠玲解为“并不独言今”^③，刘彬译为“不是说今天才是这样子”^④，这些解释都非常勉强，难以服人。

我意“独今”之“今”当读为“信”，说见上文。“‘非’言独今”即“非信”说的是“独信”。由于“非今之故”是“非信之故”，讨论的是“信”的问题，所以这里说“‘非’言独信”。由此看，“独”不能读如本字，解为独自，而当读为“渎”。“渎”古音为屋部定母，“独”声韵皆同，故可通用。刘熙《释名·释水第四》：“渎，独也，各独出其所而入海也。”^⑤因此，“独今”当读为“渎信”，即弃信、背信，正与“非信”义同，所以能互训，用来解释“非信”。张洽(1161-1237)《春秋集注》：“交相盟会，纷纷离合，惟利是视，烦盟渎信，祇以长乱”，“其为人渎信而好乱，不仁而佳兵，人理灭矣，宜其不逾年，见杀于齐也”^⑥。其“烦盟渎信”之说，正是“非信”之义也。所以，“非言独今也”当读作“‘非’言渎信也”，是说爻辞的“非信之故”之“非信”，意思是“渎信”，不讲信用，背信弃义。孔子对《蹇》卦六二爻辞的这一解释，可以说是非常精彩。

“古以状也”一句，赵建伟以为：“‘以’同‘已’。‘状’，如此。‘古以状也’即自古已然、自古就是如此。”^⑦陈惠玲译为“古代就是这样的”^⑧。连劭名则认为：“‘古以状也’，比类于古也。状、类义同。”^⑨张政烺(1912-2005)则认为：“‘古以状也’，‘状’疑为‘然’字之误。”^⑩陈剑按：“准确说是‘狀’字之形近而误，‘狀’读

①《临川文集》卷八十六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②赵建伟：《出土简帛〈周易〉疏证》，第208页。

③陈惠玲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三)读本·周易译释》，第93页。

④刘彬、孙航、宋立林：《帛书〈易传〉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》，第21页。

⑤刘熙：《释名》卷第一，《四部丛刊》景明翻宋书棚本。

⑥张洽：《春秋集注》卷二，清通志堂经解本。

⑦赵建伟：《出土简帛〈周易〉疏证》，第208页。

⑧陈惠玲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三)读本·周易译释》，第93页。

⑨连劭名：《帛书周易疏证》，第213页。

⑩张政烺：《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》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第104页。

为‘然’。又《衷》12上：‘子[曰]：《蹇(蹇)》之“王臣”，反故(古)也。’与此合。”^①刘彬接受他们意见，将“‘非今之故’者，非言独今也，古以状也”译为：“此言所谓‘非今之故’，不是说今天才是这样子，自古已然。”^②

这些意见都是不能成立的。首先，“古以状也”之“古”当读为“故”。其次，“以”也不必读为“已”。再次，“状”字也并非形近而讹，不必改为“狀(然)”。“古以状也”即“故以状也”。“故以状也”即“故以‘蹇蹇’状之也”。这是说，“‘非信之故’者，‘非’言渎信也，故以‘蹇蹇’状之也”。爻辞讲的不守诚信之故，不守诚信说的就是背信，所以用“蹇蹇”来形容“王臣”做事的艰难。这样，上下文意才能贯通。《论语·为政》篇载：“子曰：‘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輗，小车无軏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’”^③帛书《二三子》篇孔子对《蹇》卦六二爻辞的解释强调“王臣”“非信”、“渎信”则“蹇蹇”难行，两者是完全一致的。

陈剑以帛书《衷》12上的“‘子[曰]：《蹇(蹇)》之‘王臣’，反故(古)也’来支持上述帛书《二三子》篇“古”、“今”的释读也是靠不住的。这里的“故”没有必要读作“古”。“故”是诡诈、巧伪的意思。王念孙《读书杂志·荀子第四》有《诈故》条可以参考，其文曰：

“不隆本行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。”念孙案：故亦诈也。《晋语》：“多为之故以变其志。”韦注曰：“谓多作计术以变易其志。”《吕氏春秋·论人》篇：“释智谋，去巧故。”高注曰：“巧故，伪诈也。”《淮南·主术》篇：“上多故则下多诈。”高注曰：“故，巧也。”是“故”与“诈”同义。《王制》篇曰：“进退贵贱则举幽险诈故。”《大戴记·文王官人》篇曰：“以故取利。”《管子·心术》篇曰：“恬愉无为，去知与故。”《淮南·原道》篇曰：“偶嗟智故，曲巧伪诈。”“故”皆谓诈也。故曰：“不隆本行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。”杨云：“故，事变也。”则分“诈”、“故”为二义，失之矣。^④

所以，帛书《衷》篇之“反故”，就是反对欺诈的意思。为什么说《蹇》卦六二爻辞的“王臣蹇蹇”是“反故”，是反对欺诈？因为爻辞有“匪躬之故”说。“匪躬”就是“非信”，不讲诚信，就是“渎信”，背信弃义。孔子说由此导致“王臣蹇蹇”的局面，不正是“反故”，反对欺诈么？由此可知，帛书《衷》篇的“反故”说，不仅不是笔者上说的反证，反而更能坐实笔者对帛书《二三子》篇孔子《蹇》卦六二爻辞论述的释读。

扫除了这些文字的障碍，帛书《二三子》篇的这一段文字就可写作：

《易》曰：“王臣蹇蹇，非信之故。”孔子曰：“王臣蹇蹇”者，言其难也。夫唯知其难也，故重言之，以戒申也。君子知难而备之，则不难矣；见几而务之，则有功矣。故备难者易，务几者成。存其人，不言吉凶焉。“非信之

①裘锡圭主编：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（叁）》，第43页。

②刘彬、孙航、宋立林：《帛书〈易传〉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》，第22页。

③《论语注疏》卷二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④王念孙：《读书杂志·荀子第四》，清道光十二年刻本。

故”者，“非”言读信也，故以状也。

译成现代汉语，就是：

《周易》说：“王臣蹇蹇，非信之故。”孔子说：“所谓‘王臣蹇蹇’，是说他们处境困难。正因为知道他们处境困难，所以重复称之为‘蹇蹇’，以叮咛告诫之。君子知道事情艰难而有充分的准备，就不难了；发现了事情细微的征兆就立即去做好它，就会取得成功。因此对艰难有准备就容易，发现征兆就去做就能成功。以人的品性行为为重，对人讲信用，就不要计较什么吉凶利害。所谓‘非信之故’，‘非信’说的就是背信弃义，所以其后果就用‘蹇蹇’来形容。”

五、结论

如果笔者以上的分析能成立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：

一是《蹇》卦六二爻辞的“躬(今)”当读为“信”。

二是从“非信之故”来看，“蹇蹇”当为本字，义为艰难；《蹇》卦所有“蹇”字同。将“蹇蹇”训为“处难”“处蹇”、“能涉蹇难，而往济蹇”、“不避艰难，尽心竭力”，这些糅合了爻位说的解释，都不可信。而将“蹇”读为“謇”，训为直谏，也不符合帛书《二三子》篇、《衷》篇的说解。

三是“故”义为缘故，王引之训为“事”不可取。

四是《蹇》卦六二爻辞的逻辑性、思想性很强，整个爻辞强调的是诚信对于政治的重要。由此可知，《周易》卦爻辞富于哲理，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卜筮之书视之。

【作者简介】廖名春，历史学博士，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。研究方向：历史文献学。